从契丹大小字到女眞大小字（特約稿）

金光平

女眞原沒有文字，及破辽获契丹，汉人，始通契丹。汉字①。建国之后，对国内文移来往，对邻国交涉通訊，都是借用契丹文字②。这种情形和滿洲建国之初借用蒙古文字如出一轍。契丹語是蒙古系統的語言，女眞語是通古斯系統的語言，所以女眞人借用书写契丹語的契丹文字一定要通过翻譯，自然是很不方便的。清太祖命額尔德尼·噶盖等制滿洲文字时說："汉人讀汉文，凡习汉字与未习汉字者皆知。蒙古人讀蒙古文，虽未习蒙古字者亦知之。今我国之語，必繹为蒙古語讀之，則未习蒙古語者不能知也"③。这就是清太祖命制滿洲文字的动机。可以想象女眞人用契丹字时当然也有这样的同感，因此金太祖才命完顏希尹和叶魯制女眞字④。天輔三年（1119）八月，字书成，太祖命頒行之⑤；后来熙宗也制女眞字，于天眷元年（1138）正月頒行⑥。希尹等所制，謂之女眞大字，熙宗所制，謂之女眞小字⑦。天眷元年九月，詔百官詰命女眞、契丹、汉人各用本字，渤海人同汉人⑧。这是女眞大字正式用在官方文件的开始。至熙宗皇統五年（1145）才有"初用御制小字"的記載⑨。自此以后女眞大字和女眞小字并行使用，終金一代一直如此。在女眞大、小字已經行使的时候，契丹文字并沒有废止，也还同样行使着。直到章宗明昌二年（1191）十二月，才停止了契丹文字的使用，并且前此似乎女眞文字与汉文尚不能直接对譯，还要通过契丹文字为媒介⑩。

女眞大字与女眞小字二者之間有什么区别，《金史》上并沒有說明，关于大字的記載，《金史》上只說："希尹乃依汉人楷字，因契丹字制度，合本国語，制女眞字"⑪。至于小字是什么形状，如何制法，根本就沒有說明。現在传世的女眞文字，有《华夷譯語》中的女眞館来文、杂字⑫，另外还有"宴台女眞进士題名碑"；"得胜陀頌碑"，"朝鮮庆源郡女眞国书碑"，"朝鮮北青郡女眞国书摩崖"，"海龙县楊树林山女眞国书摩崖"，海龙县半截山女眞国书摩崖"，"奥屯良弼饯飲碑"⑬，"永宁寺碑阴女眞国书"等八个石刻及女眞

① 《金史》卷66，昂传。
② 《金史》卷73，完顏希尹传。
③ 《东华录》天命卷一，己亥二月。
④ 叶魯同完顏希尹共同制字，見《金史》卷35"礼志"。
⑤ 《金史》卷2，太祖本紀。
⑥ 《金史》卷4，熙宗本紀。
⑦ 《金史》卷73，完顏希尹传。
⑧ 《金史》卷4，熙宗本紀。
⑨ 《金史》卷4，熙宗本紀。
⑩ 《金史》卷11，章宗本紀。
⑪ 《金史》卷73，完顏希尹传。
⑫ 明永乐初四夷館編，《华夷譯語》"女直館来文、杂字"也簡称《女眞譯語》。
⑬ 亦名"婆和題名残石"。

文印側文字等件⑭，和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⑮与《吾妻鏡》⑯所录女眞文字，都与《女眞譯語》字体相同，也就是一般所謂女眞小字。至于女眞大字是什么形状，現在还是一个謎⑰。过去陕西乾陵"大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"曾被认为是女眞大字，朝鮮"八角鏡"和"李王博物館所藏圓鏡"也曾被认为是女眞大字，現在都判明是辽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。在錦西西孤山契丹文"蕭孝忠墓志"出土以前，"故太师銘石記"曾被认为是伪造的⑱，日本人今西春秋所藏的銅印背面刻字被认为是女眞小字⑲，錦西蕭墓文字出土后才弄清以上都是錦西式的契丹文字。并且也打破了契丹小字是回鶻字形說法的誤解⑳。可見在沒有經过充分調查研究而作出来的判断，每每是会产生錯誤的。

为什么一般学者都认为現在传世的《华夷譯語》中的女眞文字是小字呢？这是因为清代的麟庆在他所著的《鴻雪因緣图記》第二集"宴台訪碑"中引用了刘师陆（子敬）的一段話：

"且查郎君行記刻于天会十二年，其时小字未頒，則彼为大字，此为小字，更无疑义"。当时麟庆也贊許这个意見，以后中西学者都是根据这个記載认定"宴台女眞进士題名碑"的字是女眞小字。但是他这段話是有問題的，因为他誤认"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"是女眞大字，所以断定"进士碑"是小字。自然与"进士碑"字体相同的字都是女眞小字了。我认为在沒有发見另一种女眞文字以前，就确定現在传世的女眞文字是小字，还是为时过早。

女眞文字有大、小两种文字并行，是受了契丹文字大、小字并行的影响。現在要辨明女眞大字与小字的問題，必須先就契丹大字与小字言之。据《辽史》所載：

"神册五年（920）春正月乙丑，始制契丹大字。九月壬寅；大字成，詔頒行之"㉑。又据《契丹国志》載：

"天贊六年㉒七月，渤海既平，乃制契丹文字三千余言"㉓。

若《契丹国志》所記不誤，則似乎是受了渤海文字的影响才想起制契丹字来，这可以作为渤海曾有文字的旁証㉔。

又按《女真国志》卷廿三：

"至阿保机，稍并服諸小国，而多用汉人，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損之，作文字数千，以代刻木之約。"

《大金会要》卷八也有同样的記載。

⑭有"移改达葛河謀克"印側文字，"可陈山謀克"印側文字等件。
⑮明刊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中《宛委余編》卷186載有女眞文字，清四庫本已刪去。
⑯《吾妻鏡》所載女眞文字并非叠体，实与《女眞譯語》字体相同。
⑰日本人石田干之助氏曾在《史学杂志》第53編上討論过这个問題，但是沒有結論。
⑱《滿洲中央博物館論丛》3号，李文信"契丹小字'故太师銘应記'之研究"。
⑲《东洋史研究》3卷4号載"女眞字銅印"并今西春秋記。
⑳欧洲学者布育尔，馬克尔，裴勒珉，日本学者白鳥庫吉，島田好等都有过这种說法。
㉑《辽史》卷1，太祖本紀。
㉒辽平渤海在天贊五年正月，本年二月即改元天显，《契丹国志》誤。
㉓《永乐大典》引《紀异录》亦載此語。
㉔《金史》卷1，世紀：粟末靺鞨，始附高丽，姓大氏。李勣破高丽，粟末靺鞨保东牟山。后为渤海，称王，传十余世，有文字、礼、乐、官府、制度。有五京、十五府、六十二州。
又《高丽史》卷1，太祖世家，"乙酉"八年九月庚子条，文略同前。

《契丹国志》一书，为宋叶隆礼奉勅撰，时間在《辽史》之前。《四庫全书总目提要》认为是伪书。該书訛誤疏漏的地方誠然是很多，但是也有些比《辽史》詳确的地方，如：辽太宗建国号曰大辽，道宗即位改为大契丹，至道宗咸雍二年（1066）又改为大辽，此事已由石刻証实，《辽史》不載。又穆宗諱"璟"，后更名"明"㊀，《辽史》亦未載，由《資治通鑒》和石刻的缺笔亦已証明。是《辽史》反較《契丹国志》为疏处，以此亦不能认为此书的記載毫无价值。

关于契丹小字的記載，見于《辽史》皇子表㊁迭剌：

"（迭剌）性敏給，……回鶻使至，无能通其語者。太后謂太祖曰：'迭剌聰敏可使'，遣迓之。相从二旬，能习其言与书，因制契丹小字，数少而該貫"。

据上文說的很清楚，小字是受了回鶻字暗示作成的。所以在沒有发見两种契丹文字以前，一般学者认为契丹小字是回鶻字形。当时回鶻字是音节字母的文字，即古畏吾尔文字，也就是蒙古文字、滿洲文字所从出的一种文字。

依上所記，我們可以肯定（1）契丹大字是增損汉字笔划制成的，（2）契丹小字是依仿回鶻文字制度，制出若干音节字母而成的。現在发見的"辽庆陵哀册"文字，正是采用汉字形制成若干音节字母，用之拼写的文字㊂。至于錦西蕭墓式的文字，正是增損汉字笔划而成，沒有拼音的迹象。是錦西字与契丹大字制字的說法相合，宜为大字；庆陵字与契丹小字制字的說法相合，应为小字。金毓黻、历鼎煊两先生对于契丹小字也有与我相同的意見㊃。

过去以女眞文字校对庆陵契丹文字，找不出承受的綫索来，至錦西蕭墓誌出土之后，才了然女眞文字是根据錦西契丹文字制成的。錦西文字有些是直用汉字，如：

月，日，二，三，五

等字，至女眞字則稍加点划作

月，日，二，彡，辶

又由契丹字变为女眞字也只是稍加点划，如：

年　契丹字作　　女眞字作　

龙　契丹字作　　女眞字作　

人　契丹字作　　女眞字作　

以上是表意字，其表音字如：

汉字"波"bo，契丹字作"我"po，女眞字作"孜"fo

汉字"失"ʃi，契丹字作"天"ʃi，女眞字作"丈"ʃi

都很容易看出承受的关系，其他如：

㊀《契丹国志》卷5。

㊁《辽史》卷64，表二。

㊂参看罗福頤："契丹国书管窺"（載《燕京学报》37期，1949，12），及罗福成，日本人山路广明，村山七郎，爰宕松男諸氏著作。

㊃金毓黻：《辽陵石刻集录》卷1："余意小字之制既在大字之后，且數少而賅貫，則契丹兴宗、道宗二陵內国书哀册必契丹小字也。姑先作此假定，以待来日之印証。

又　金光平，會數公："錦西西孤山契丹墓志試譯"中述及庆陵为契丹小字，錦西字为契丹大字之意見。該文因与閻万章："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"同时交《考古学报》，因考释之点与閻文重复未发表，仅摘录与閻氏意見不同之点附录閻文后，見《考古学报》1957年2月号。

又　历鼎煊："試用古国記文比較研究契丹文字"（《中山大学学报》，2期，1957年8月）

丞，买，寸，并，刘，犮，廾，升，昇

等字，都是女眞字之所有。因此可以肯定現存女眞字是依錦西契丹字所制。

錦西契丹字制字方法頗为笨拙，多有直用汉字，此等粗疏的造字方法，时間上也应該是在前；庆陵契丹字懂得用音节符号連綴成文，較錦西字实为进步的文字，也应是后制的。因此我們可以大胆断定錦西字是契丹大字，庆陵字是契丹小字，因为只有这样的判断，才与史书所記脗合。至于辽代正式公文（哀册）为什么反用小字呢：可能是因为大字过于粗陋。这两种字各有长短，庆陵文字組織精审，而笔划繁多，写起来麻煩；錦西字虽較粗疏，写起来方便。大概这就是两种文字并行使用的緣因。

假定錦西文字是契丹大字，庆陵文字是契丹小字，那么仿照錦西文字制成的女眞文字也应該是大字。熙宗所制的女眞小字当然是仿照契丹小字（庆陵字）制造的一种音节綴音文字。清錢大昕《元史艺文志补》中載有《女眞字母》一书，現存女眞文字是談不到字母的，可以想象这是女眞小字（音节文字）的字母。至于金初仿照契丹文字制字的时候，为什么不采用音节綴字的庆陵字形，而反采用粗陋的錦西字制字呢：可能是因为辽制对文字书籍輸出的禁令森严㊄，庆陵是政府公文使用的正式文字，禁例严些，錦西字是民間使用的文字㊅，禁例可能較为松弛。女眞民族在辽代是边外羈縻之区，錦西字或輸入較早，女眞人遂先采用了这种文字

現今一般学者都认为传世的女眞文字（《女眞譯語》及各石刻女眞文字）为女眞小字，我总感覚沒有充分根据，不揣簡陋地举出几个疑点来，提供研究女眞文字的学者們参考指正，庶几得到正确的认識，这也算是对于女眞文字学的点滴供献吧：現将所举疑点分列于下：

（1）女眞大字頒行于金太祖天輔三年（1119）八月，女眞小字頒行于熙宗天眷元年（1138）正月，而熙宗皇統五年（1145）五月又有"初用御制小字"的記載，可能是頒行之后还有某些缺点，經过一番修改才实际使用，可見在皇統五年以前还沒有使用女眞小字。在《朝鮮庆源郡女眞国书碑》的第四面㊆第五行記有年月，可惜此碑上部折断遺失，其年号适在失去部分。年月是这样：



此碑为修建佛寺的功德題名，襄助其事的为曷懶路、速頻路、中京等路各猛安的人士。碑文中載有爰也窟猛安，当时屬曷懶路。考爰也窟猛安于大定十八年（1178）已經移屬河北

㊄《梦溪笔談》卷15載："幽州僧行均，集佛书中字为切韵訓詁，凡十六万字，分四卷，号《龙龕手鏡》，燕僧智光为之序，甚有詞翰，契丹重熙二年集。契丹书禁甚严，传入中国者法皆死。熙宁中有人自虜中得之。

㊅"庆陵哀册"文字是官方鄭重文字，"錦西蕭孝忠墓志"及"故太师銘石記"皆民間作品。更有日本人今西春秋所藏銅印，正面印文是庆陵字体，背面篆字是錦西字体，可以說明两种契丹文字使用的性质。

㊆碑在朝鮮咸鏡北道庆源郡东原面禾洞佛寺址。碑为方柱形，四面刻字，皆女眞字无汉字譯文。上段一部分已折断失去，現仅存下段。《朝鮮金石綜覽》載有碑文复原拓影，分之为第一面、第二面、第三面、第四面。但該書作将次序弄錯，第一面实为第三面，第二面实为第四面，第三面实为第一面，第四面实为第二面。安鳥弥一郎：《女眞金石志稿》也承其誤。我現在所列次序系按碑文改正排列。

㊇《金史》卷82，烏古論三合传："曷懶路爰也窟河人，后徙眞定，……（大定）十八年，世宗追录三合旧劳，授其子大兴河北西路爰也窟河世袭猛安"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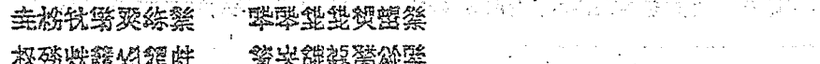
西路㊽据此，我們可以知道此碑建立的时期应該在大定十八年以前。又碑文中有“中京”字样，中京为辽五京之一，建于辽統和二十五年（1007）。金太祖天輔六年（1122）取之，仍称“中京”。至海陵貞元元年（1153）三月詔改为北京㊾，以后金朝就沒有“中京”的名称了。以此更知道此碑建立的时期应該在貞元元年以前。由天輔六年到貞元元年以前經过五个改元，是：

1、太宗天会　　2、熙宗天眷
3、熙宗皇統　　4、海陵天德
5、海陵貞元

其中天会是九月改的元㊿，天德是十二月改的元(51)，海陵貞元元年三月“中京”就改为“北京”了。此碑建立的时代只有熙宗天眷、皇統两个年号可以当之。但是，皇統五年才“初用御制小字”，若說此碑是女眞小字是不大可能的。此碑上的字体却正是《华夷譯語》的女眞文字。

（2）“大金得胜陀頌碑”碑阴的女眞文字也是与《华夷譯語》相同的字体。这个碑是金世宗紀念金太祖破辽的“丰功伟績”和“受天眷命”追述祖德的作品，为什么不用太祖所制的女眞大字（完顏希尹等受太祖之命創制），而反用熙宗所制的小字呢？世宗是一个“尊祖崇先”的人，不应該舍太祖所制大字而用熙宗所制的小字。大定初，謚熙宗为閔宗武灵皇帝，其謚法并非美称，大定十九年（1179）始升祔于太庙，改謚弘文獻武庄靖孝皇帝，二十七年（1187）改庙号为熙宗(52)。此事虽与本文不很相涉，可是，由此可以看出世宗对熙宗亦并非十分崇拜。不可能以熙宗所頒小字书写紀念太祖的碑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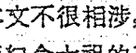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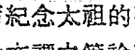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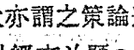
（3）女眞进士科考試以策，論及詩，故亦謂之策論进士。定制以策、詩試三場，“策”用女眞大字，“詩”用小字。“論”則后添，以經文为題(53)。为什么“策”用大字（“論”可能也是用大字），而“詩”用小字呢？現在还沒有发見女眞文的詩，若发見女眞文的詩，則大、小字的問題立刻就可以解决了。但是，我們可以想象出来，散文用大字，詩用小字的原因，一定是小字有适合于写詩的特点。現存的女眞文字是不适合于写詩的。这种女眞字有一字一音节的，有一字两、三个音节的，也有两三个字才能凑成一个音节的，写出詩来一定是长短参差不齐，殊不美观，如欲其七个字一句或五个字一句是势不可能的。女眞文詩虽不見于世，而契丹文詩却有发現。朝鮮李王博物館所藏圓鏡，正是契丹文的詩。現录于下面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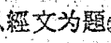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首七言絕句，其字体与“庆陵哀册”正同(54)观此二十八字，每七字一句甚为整齐。

㊽《金史》卷24，地理志：北京路条。
㊾《金史》卷3，太宗本紀：“天輔七年……八月戊申，太祖崩，九月乙卯葬太祖于宮城西。國論勃极烈果、鄂王昂、宗峻、宗幹率宗亲百官請正帝位。……丙辰，即皇帝位，已未祀天地，丙寅大赦中外，改天輔七年为天会元年”。
㊿《金史》卷5，海陵本紀：“（皇統九年）十二月丁巳，勿土，阿里出虎內值，是夜（大）兴國取鈅启門納海陵、秉德、（唐括）辯、烏帶、徒单貞、李老僧等，至寢殿，遂弑熙宗。秉德等未有所属，忽土曰：“始者議立平章，今复何疑。乃奉海陵坐，皆拜称万岁。……己未大赦，改皇統九年为天德元年。
(51)《金史》卷5，熙宗本紀。
(52)《金史》卷51，选举志。
(53)《燕京学报》37期，罗福頤氏《契丹国书管窺》謂其中有十二字見哀册中。

其第一句、第二句、第四句末字为：

1、 折为 
2、 折为 
4、 折为 

可知是压韻的，而第三句末字为：

3、 折为 

却不协韻，也正合于汉詩七言絕句第一、第二、第四句压韻，第三句不压韻的規律。女眞文詩可能是受契丹詩的影响，是能够五个字一句或七个字一句，隔句压韻，排列整齐，完全模仿汉詩的形态和規律的。这样就断不是現存女眞文字所能表达的了。熙宗所制的女眞小字一定是依契丹小字（庆陵文字）所制的。因此以之写詩合适，这就是以女眞文考試时，写詩要用小字的道理。

据上文举例，可能現存女眞文字（《华夷譯語》女眞文字）正是女眞大字。女眞小字虽未发現，也可以假定是庆陵哀册契丹字形的一种音节字母連綴成文的文字。这必須待发掘工作获得另一种女眞文字金石資料后，才能确定女眞大、小字两种文字的形式。

現在女眞文字的研究，比契丹文字研究有两个有利条件，因此女眞文字可能完全譯出。两个有利条件是：

1、女眞文字有《华夷譯語》的工具书，虽然此书錯謬很多，但是通过它大半的字音，字义可以了解，从而推求《譯語》所不載的詞义、字音易于指手。

2、女眞語是滿洲語的前身，詞汇、文法十同八九，以滿洲語推究女眞語百分之九十是可以解决的。

契丹文字沒有这样好的条件，既沒有《华夷譯語》和《番汉合时掌中珠》（西夏文詞汇）等工具书可茲参考，其与达呼尔語之关系也还不够明显㊺，以此研究契丹文之进展远不如女眞文和西夏文。若以錦西契丹文字与現存女眞文字的关系推測，金熙宗仿照庆陵契丹字形式所制成的女眞小字，其所用音节字母一定相去不远，或者沒有什么大的改变。以現存女眞語的資料推求之，可能比研究現在的女眞文字更加容易。假如道了女眞字母的讀音，据以追寻契丹字母的讀音，庆陵契丹文字的研究自可迎刃而解了。总而言之，将来另一种女眞文字的发見，不但对女眞字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，即对契丹文字的研究也能有莫大的帮助。

以上仅是个人当茭之見，愿与当世研究女眞文字和契丹文字的学者們共同討論，庶得出正确的結論，是本人所望！

㊺达呼尔語为蒙古系統之語言，由現代达呼尔語校对蒙古語已可証实。《辽陵石刻集录》卷一引达呼尔人孟鎮汉氏語，謂契丹語为达呼尔語之說，自較《辽金元三史国語解》謂契丹語以察伦語为本語之說为相近。唯以《辽史》契丹語校达呼尔語多不相合，非如女眞語与滿洲語之近似，纵使达呼尔族果为大契氏裔，其語言之变迁也已經是很大了。